

毛泽东《送瘟神》诗中的为民情怀

□ 罗元生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以《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为题,报道了当地消灭血吸虫病的消息。毛泽东看到这一消息,激动不已。他凭窗遥望南天,以诗言志,欣然命笔,一气呵成豪迈诗篇《送瘟神》。今天,我们再读这两首七律,仍可从中看出共和国领袖毛泽东对人民的一颗赤诚之心、一片奔涌之情。

一是忧民之心。关注人民群众生活,以人民为主体,是毛泽东一贯的执政理念。出身于偏僻山村一个农民家庭的毛泽东,对人民群众的生存状况有着深刻的了解,对他们的苦难生活有切身的体验,他对人民的热爱和情感是发自内心的。在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在当权的统治者眼里,百姓只是草芥,根本不会受到应有的关注和重视。直到有了中国共产党、直到新中国成立,才使人民群众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当家作主地位。

毛泽东的忧国忧民之情在关注我国南方广大农村消灭血吸虫病这一件事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血吸虫病是危害民众身心健康、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疾病。当年,血吸虫病在我国流行甚久,遍及南方12个省市,患病的人数1000多万,受感染威胁的人口超过1亿人,对于人民健康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轻则丧失劳动力,重则死亡。患病的妇女不能生育,患病的儿童发育受影响,病区人口减少,生产力下降,少数病区甚至田园荒芜,人烟凋敝。

人民群众把这种血吸虫病叫“瘟神”,把消灭这种病叫“送瘟神”。毛泽东在诗中所说的“送瘟神”,就是把民间传说中的司瘟疫之神送走,打一场全歼血吸虫病的人民战争。

1950年冬,血吸虫病重灾区之一的上海市郊任屯村农民联名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尽快治好血吸虫病。信发出不久,毛泽东派出的医疗队就到了任屯村,不分昼夜查病治病,抢救了不少病人。后来,任屯村农民代表还被请进京参加国庆观礼,见到了敬爱的毛泽东。

因此,当毛泽东得知江西余江县消灭了为害百姓的血吸虫病时,他那种激动欣喜之情,顷刻间化作了不朽诗句:“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赤诚之心和喜悦之情跃然诗行。

二是爱民之情。1955年仲夏正当农忙时节,毛泽东外出视察工作。他一路从北向南,有时细察,有时访问,有时召集当地负责人座谈。到了杭州,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开会期间不要搞其他活动,要帮助他去了解杭州郊区农民的生活情况。

于是,这几名工作人员就到杭州

郊区的余杭地区去调查访问。他们走进一座村庄,了解到分到田地,再也不受压迫、不受剥削的普通老百姓对毛泽东、共产党的深厚感情时非常感动;可是,由于害了“大肚子病”(这是当地群众的叫法,即血吸虫病)又使他们万念俱灰。当广大群众听说毛泽东在想办法帮他们医治这种“自古以来不治之症”时,都露出了笑容。

工作人员回来后,把情况一五一十地报告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后寝食难安,他的卫士李家骥曾回忆一天夜里他值班时的情况:“毛主席说,我睡不着。你们这次去看,那么多孩子,那么多年轻人,那么多上了岁数的老人,都得了血吸虫病,我们工作没有做好啊。我看他老人家心情不好,就说,主席,我给你擦擦澡,你早点休息吧。毛主席说,小李啊,我睡不着,我们要想办法,及早治这个病,根除这个病还要想办法。”

于是,毛泽东对此展开了进一步的调查研究。他先后同上海市委和华东地区几个省的省委书记座谈,了解情况,商讨对策。

1955年11月17日,毛泽东专门请在北京的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来杭州,报告关于防治血吸虫病的情况。徐运北回忆道:“当我汇报现在病人多,治病还没有理想的药物时,毛主席说,要充分发挥科学家的作用,要研究更有效的防治药物和办法。当汇报到管理粪便、管理水源、消灭钉螺等任务艰巨时,毛主席说,要发动群众,不依靠群众是不行的,要使科学技术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省市委书记们插话谈到各地发病情况和群众的要求,都赞成要把血防工作和发展生产结合起来……”

毛泽东又指示徐运北要立即到疫区实地调研。后来,徐运北在回忆中说:“在疫区,我耳闻目睹,进一步认

识到血吸虫病的危害,更加体会到毛主席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毛主席从方针政策到工作方法都作了明确具体的指示,使我受到的教育终生不忘!”

毛泽东根据调查到的这些资料,于1955年11月在杭州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

在会上,毛泽东提出:“对血吸虫病要全面看,全面估计,它是危害人民健康最大的疾病,应该估计到它的严重性。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要消灭危害人民健康最大的疾病,防治血吸虫病要当作政治任务,各级党委要挂帅,要组织有关部门协作,人人动手,大搞群众运动。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

这个指示,即便就是在今天读起来仍感到温暖和振奋!毛泽东的思想与情怀、意志与胆略、决心和行动,令人动容。这个指示,对全党、全国人民至少有3个明确的信号:首先是科学的判断。我们应该如何正确认识血吸虫病,它的危害性严重性丝毫不能低估。这种病夺去了多少人的生命,又让多少人徘徊在生死的边缘。其次是切实的行动。党委要挂帅,部门要合作,群众要参与。要人人动手,大搞群众运动。再就是坚定的目标,咬定青山不放松,一定要胜利,一定要全部彻底消灭血吸虫这个可恨的天敌。

三是为民之举。1955年11月22日至25日,中央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7个省市的省、市、地、县的党政领导和防治科技人员及专家共100余人。会上传达了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党中央关于成立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的决定,提出了7年消灭血吸虫病的大体部署,以及落实这一部署的具体行动

方案。

中央防治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也于12月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会议,总结了几年来有关血吸虫病科学研究的成果,研究了准备防治的各种措施,明确了综合性措施是今后防治血吸虫病工作的方向。

毛泽东一直关注着这项工作的进展情况。他一面号召、部署和检查这项工作的贯彻执行情况,一向向有关专家学者调查研究彻底消灭血吸虫病的意见与科学方法。

1956年2月1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战斗号召。3月3日,毛泽东接到中国科学院水生动物专家秉志2月28日写给他的信:鉴于土埋灭螺容易复生,建议在消灭血吸虫病工作中,对捕获的钉螺采用火焚的办法,永绝后患。毛泽东看了非常高兴,当即指示卫生部照办。

从此,毛泽东到各地视察时,都要把这项工作当作必须了解和检查的内容。

1956年,毛泽东接见了广东省从事血防工作的陈心陶教授,听取了他对防治血吸虫病的意见。1957年7月7日,毛泽东在同上海各界人士的座谈会上,又特意向有关专家询问了防治血吸虫病的情况。1958年,毛泽东在安徽视察工作时,专门到省博物馆察看防治血吸虫病的规划图,查询进展情况,促其实现。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江西省余江县首先消灭了血吸虫病的喜讯。消息传来,全国人民欢呼:中国人民有了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祸,什么都可以战胜!

在《送瘟神》诗的后记中,毛泽东写道:“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余江县基本消灭了血吸虫,12省、市灭疫大有希望。我写了两首宣传诗,略等于现在的招贴画,聊为一臂之助。就血吸虫所毁灭我们的生命而言,远强于过去打过我们的一个或者几个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抗日战争,就毁灭一点来说,都不及血吸虫。除开历史上死掉的人以外,现在尚有一千万人患疫,一百万人受到疫情的威胁。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今之华佗们在早几年大多数信心不足,近一二年干劲新高,因而有了希望。主要是党抓起来了,群众大规模发动起来了。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从这段后记中我们可看出,毛泽东为打赢消灭血吸虫这场大战,他的心情是多么急切、感情是多么投入、决心是多么坚定!

(摘自2019年第6期《党史纵览》,原标题为《〈送瘟神〉诗中的毛泽东为民情怀》)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初心易得,始终难守。回顾邓中夏的一生,他的初心更是经历了义与利、苦与乐、生与死的巨大考验。

首先是革命大义与个人利益冲突的考验。1920年7月,邓中夏从北大毕业。他的父亲邓典谟在北洋政府铨叙局任职,托人在农商部为邓中夏找到了一个待遇优厚的职位。父亲高兴地把农商部的“委任状”拿给邓中夏,却被邓中夏退了回去。邓典谟问儿子为何要把“委任状”退回时,邓中夏说:“我不做官,现在社会如此腐败。当官的人,都是对老百姓敲骨吸髓的。当这样的官有什么意义呢?”在普通人看来,邓中夏白白浪费了大好的机会,有点自毁前程。但这实际上是邓中夏不忘初心的表现。邓中夏充满了革命的豪情,在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曾赋诗“禽猕歼除之,我行适我素”。

其次是革命征途中共苦与乐的考验。1931年1月,邓中夏被错误地撤去党内外职务,到上海接受调查。到上海后,邓中夏没有被分配任何工作,也没有经济援助,吃饭都成了问题。1932年2月中旬,他被安排到中共沪西区委宣传部做一些写传单、刻钢板的杂务。他认真负责,一丝不苟。有人为他鸣不平,邓中夏回答:“共产党员嘛,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后来,邓中夏以自己为例,耐心开导一些同志:“我们这样的人做事,不能选择哪儿干得痛快,重要的是看对革命是否需要。最危险、最危难、别人都不喜欢的岗位,经得起考验的老同志,应当义不容辞地站上去。”

最后是死亡的终极考验。1933年5月15日晚上,因叛徒出卖,邓中夏在上海法租界被捕。面对敌人的招降和种种酷刑,他如同钢铁战士,始终没有屈服。但是,他知道自己目标大,不可能出去了。于是,对难友说:“请

邓中夏:用生命诠释初心

□ 贺先国

告诉同志们,我邓中夏化成灰也还是共产党员。”在临终遗言中,邓中夏还鼓励难友们坚持斗争,说:“共产党人被捕后要有骨气,要坚强,在任何情况下,不能失去气节。一个人不怕短命而死,只怕死得不是时候、不是地方。中国人很重视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为了个人升官发财而活,那样苟且偷生的活,也可以叫作虽生犹死,真比鸿毛还轻。一个人能为了最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为了勤劳大众的利益而死,这是虽死犹生,比泰山还重。人只有一生一死,要死得有意义,死得有价值。”这正是他最初树立的革命理想。1933年9月21日凌晨,邓中夏英勇就义。

(摘自2019年第2期《湘潮》)



邓恩铭写给母亲的最后一封信

□ 王相坤

邓恩铭(1901—1931),水族,贵州荔波人。中共一大、二大代表,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山东党组织早期组织者和领导者。1929年1月,邓恩铭因叛徒告密在济南被捕。他领导狱中共产党员发动了两次越狱斗争,使7名同志先后脱险,而他自已则因身体虚弱,逃出监狱又被捕回。1931年8月,国民党反动当局以“意图颠覆国民政府”的罪名,判处邓恩铭死刑。殉难前,邓恩铭强忍着病痛给母亲写了题为《诀别》的诗:

卅一年华转瞬间,
壮志未酬奈何天;
不惜惟我身先死,
后继频频慰九泉。

(摘自2018年第8期《党史文苑》,原标题为《中共创立时期共产党员人的初心解读——邓恩铭篇》)

1920年早春,在浙江义乌分水塘村一间简陋的柴屋中,陈望道用木板和凳子支起简易的书桌。两部词典占据了书桌大部分位置。此后的几个月,他把自己封闭在这里,时而奋笔疾书,时而蹙眉深思,时而字斟句酌。累了,他就在铺板上短暂休息一小会儿;饿了,他就匆匆垫几口母亲送来的简餐。虽是早春,江南仍时有料峭春寒。这天,母亲送来粽子,还特地加了一碟红糖。红糖有御寒的作用,她特别嘱咐陈望道,吃粽子要蘸红糖。陈望道一边应着,一边把粽子蘸着墨水,当作红糖吃下去了。墨水和红糖的味道当然不一样,然而,完全沉浸在《共产党宣言》中的陈望道,竟然品味不出两者的差异。直到母亲察觉,陈望道才解释道,真理的味道是很甜的。

这似乎是一个精彩绝妙的隐喻。闪耀着真理光芒的《共产党宣言》,对中国先进分子产生了多么强大的吸引力,又与中国先进分子有多么天然的亲近感。《共产党宣言》所言说的,正是在中国先进分子内心中回荡了良久的理想。在她的照耀和启发下,这批先进分子内心中的理想,变得清晰、明亮和坚定起来。中国共产党就要诞生,复兴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也慢慢形成和塑造起来了。

4月底,陈望道刻苦译好的《共产党宣言》被带到了上海。8月,《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译本出版了。翌年8月,到上海参加党的一大的代表王尽

一本用初心守护的《共产党宣言》

□ 郑宁波

美和邓恩铭,携带陈望道吃墨汁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跨越长江,把《共产党宣言》传到了中国北方。回到济南,他们把书交给济南党组织专司党报发行和保管的张葆臣。张葆臣发现,经常同他一起参加党组织活动的刘雨辉热爱学习,就把这本书传给了刘雨辉。1926年春节,刘雨辉把这本书带回故乡滨州市广饶县大王镇刘集村,并亲手交给村党支部书记刘良才。刘雨辉指着封面上的“大胡子”说,这个大胡子叫马格斯(即马克思),他和一个叫安格尔斯(即恩格斯)的人一起写了这本书。共产党员都该学一学,会让我们知道今后该走的路。

鲁北平原上的刘集支部,是山东省乃至全国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之一。1925年,广饶最早的共产党员刘子久将刘良才发展入党,刘良才在刘集村秘密成立党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

精通语言学的陈望道,在翻译时努力做到通俗简练,他通篇用白话文翻译,还注重用汉语的俗语来实现通俗的修辞效果,翻译出了像“宗教的热忱,义侠的血性,儿女的深情,早

已在利害计较的冰水中淹死了”一类精彩的句子,“义侠”“血性”“儿女”“深情”等词汇通俗而接地气,但是,对于仅读过两年私塾的刘良才而言,“大胡子”笔下的道理还是令他不能迅速吃透。不过,想到这是一本从党的“一带回来的书,想到这是一本省城党员叮嘱能够知道今后该走的路的书,刘良才还是坚持啃下来了。此后的三个冬春,他带领党员和积极分子,在自己小院的北屋中,反反复复地读,努力把书中艰深的道理转化为更为通俗易懂的语言,讲给更多不知路在何方的中国农民听。

书一页页地翻过了,字一个个地认全了,理一句句地悟透了。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刘集村的党员渐渐懂得了“大胡子”的话,他们从中学到了反抗,学到了斗争,学到了解放。1928年,刘良才发动了打击地主豪绅的革命斗争。斗争胜利了,刘良才却暴露了,他因此无法在当地开展工作。1931年2月,山东省委安排刘良才担任潍县县委书记。

远赴潍县前,刘良才最放心不下的是这本《共产党宣言》。他预料到自

己可能被捕,这本书到底放到哪里呢?刘良才反复考虑,决定将其留在本村支部。他亲手把这本书交给刘集村支部委员刘考文,郑重地嘱托他:“你要好好保存这本书,你要把它视为自己的生命,甚至比自己的生命还宝贵。”他还说了一句刘考文终生难忘的话:“生为《共产党宣言》生,死也为它死。”

刘良才郑重的嘱托让刘考文感到了沉甸甸的责任。刘考文有时把它藏在粮囤底下,有时封进灶头,有时又转移到屋顶。虽然几易藏处,谨慎的刘考文还是常常食不甘味、夜不能寐,他唯恐这重要的著作在他手上出现问题。1932年8月,广饶西邻的博兴县农民暴动被韩复榘镇压。机警的刘考文敏锐地从博兴的局势预判敌人可能镇压广饶县,他感到自己目标太明显,一旦敌人对刘集村动手,自己必定是敌人首先下手的对象。他想到了同村的党员刘世厚,刘世厚平日里行事低调谨慎,忠厚老实,在农民堆里,一点都不扎眼。就像当年刘良才把书交给刘考文一样,刘考文再次把书交给了刘世厚。一切都如当年

的交接一样郑重和沉重。刘考文对刘世厚几乎说了同样的话:“这本书务必保存好,它比我们的生命都重要。”

就这样,这本《共产党宣言》又一次完成了转移。刘考文不久就被捕了。因叛徒出卖,刘良才也在潍县英勇就义了。

捧着这本承载了共产党员生命和鲜血的《共产党宣言》,刘世厚内心中升腾起一种无以复加的责任感。他经常变换藏书地点,但心里总是感到不踏实。在他精心呵护下,这本书一次次地躲过了敌人的眼睛,躲过了国民党的搜索,躲过了日军的扫荡。1945年,日军放火烧村,一次性烧毁了刘集村500多间房屋。老百姓被日军赶出村子。当时,刘世厚把这本书藏在山墙的“雀眼”中。被赶出村子后,刘世厚想到这本书还在自己家里,又冒着生命危险潜回村里。当时,他的房子已经被点燃了,他冒着呛人的浓烟爬到“雀眼”处,小心翼翼地掏出这本书。真是万幸。持续两天的火几乎烧尽了刘集村全部的家当,粮食烧光了,柴草烧光了,农具烧光了。这本书却在共产党员的精心呵护

下保存了下来。

刘世厚把这本书用蓝布包好,放在一个小匣子里。此后的30年间,他精心保管着这本书。

他经常会像捧着宝贝一样端详一番,每当这时,他就会想起刘良才和刘考文的嘱托。

1975年1月,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大召开期间见到陈望道,充满期待地问:“《共产党宣言》最早的译本找到没有?那是马列老祖宗在我们中国的第一本经典著作,找不到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病啊!”陈望道遗憾地摇了摇头。就在这一年,广饶县征集革命文物,84岁的刘世厚将保存了43年的《共产党宣言》交给广饶县历史博物馆。这正是陈望道翻译的本子。

这本受过血与火洗礼的《共产党宣言》经历了独特的旅程。她曾经照亮和见证了共产党人初心,共产党人则用自己的初心守护她;她曾塑造了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共产党人则用坚定的理想信念诠释她。

(摘自2017年7月1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原标题为《一部党史就是一部为初心而奋斗的历史——守初心的感人故事》)

